

目 录

开场白 寻找新的话题 员

第一视野 性别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 女性文学：在身体写作之外 缘

第二讲 男性文学与阳刚之气 苑

第三讲 男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圆

第二视野 代际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 推荐几本书 猿

第二讲 “右派”作家群研究 猿

第三讲 知青作家群研究 缘

第四讲 “新生代”作家群研究 远

第五讲 在“代沟”之外：三代作家的精神联系 苑

第三视野 阶级与人性

第一讲 阶级问题的复杂性 愿

第二讲 “十七年文学”中的部分阶级人物形象 愿

第三讲 新时期文学中的阶级问题 怨

第四讲 知识阶级形象 员

第五讲 关注“弱势群体” 猿

第四视野摇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摇说不尽的地域文化	员圆猿
第二讲摇地域文化与作家群落	员圆源
第三讲摇地域文化与作家个性	员圆愿
第四讲摇地域文化与代际文化的重叠	员圆苑
第五讲摇当代地域文化文学的发展历程	员圆苑

第五视野摇神秘文化与当代文学

第一讲摇世界与人生的神秘性	员圆怨
第二讲摇神秘主义思潮是怎样回归的	员圆园
第三讲摇“寻根文学”与神秘主义	员圆园
第四讲摇女性文学与神秘主义	员圆猿
第五讲摇现代史文学与神秘主义	员圆园
第六讲摇哲理小说与神秘主义	员圆园
第七讲摇当代志怪、传奇与神秘主义	员圆源

附摇录	员圆园
一、治学心得	员圆园
二、主要学术著作	员圆园
三、主要学术论文	员圆员

后摇记	员圆猿
-----	-------	-----

开场白 寻找新的话题

同学们,我们今天开始上的这门课叫“当代文学新视野”。为什么要开这么一门课程?因为这些年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不少同学经过激烈竞争,进入到研究生的行列以后,非常强烈地渴望早出成果。但当他们在报刊上、网络上发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好像已经被评论家说完了时,他们又会非常焦虑。就我所知,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于许多高校中。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奇观:一方面,这是一个创新意识格外流行的时代;另一方面,这好像又是一个很不容易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的时代。为什么?因为那些专家好像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就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有的同学读书有了感觉,想写点东西,就上网查资料,结果发现,自己想说的,专家们早就说了!这的确有点叫人灰心。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新文章在不断地产生?这就说明该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完嘛。

新的话题在不断产生着,这说明创新的空间还在不断扩展。这样,如何找到新的话题,就成了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说到创新,很多同学觉得关键在于掌握那些新的理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注意到以西方流行的人文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常常给人以牵强的感觉。有的评论家在照搬西方理论时常常将中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简单化,而这样一来,文学作品好像就成了理论的注脚。就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①这就意味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常常具有不可穷尽性,而这种不可穷尽性正是文学研究创新的前提所在。因此,我常常讲,理论是灰色的,而文学之树常青。我觉得,从事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对文学作品的认真阅读。我们当然应该了解那些流行的理论,但我们完全不应该让那些理论束缚了我们的文学感觉、我们的生命体验、我们的思想。

^①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重庆,北京,作家出版社,凤凰

多年以前,我曾读过美国评论家韦勒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大学里的批评》(中译文本发表在《外国文艺》1987年第3期上)。在那篇文章中,韦勒克就指出,在美国文学界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他甚至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极度虚无主义”,它“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毁灭”。而他本人是相信这样的文学观的:“文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它具有认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功能。”这显然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学观。但我是相信这样的文学观的。因为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告诉我们的,还是对那些永恒的人生话题的探讨。而我自己在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思路:文学是人学。每一代人都在记录自己生命体验的写作中不断丰富着人类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认识历史的智慧。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去表达我们对人生、时代、文学的认识。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就是我们的身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因此,在研究中国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牢记一点: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文学现象之间,是肯定存在着一种文化的隔膜的。因为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家研究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成果,而中国的文学作品是肯定有着不能被西方理论所包容的文化特色的。中国有中国的文化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上,更体现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常常不约而同地强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上。王蒙、刘绍棠、汪曾祺、贾平凹、韩少功、郑万隆、莫言、阿城、陈忠实、王安忆、余华、迟子建、阎连科、毕飞宇……这些作家对中国文学特色的强调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应该时时记得这一点,记得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这不仅是一种民族的情感,而且是我们摆脱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的尴尬状态的出路所在,是我们实现创新梦想的根本出路所在。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的评论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在《而已集》中)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那篇文章中,鲁迅完全抛开了理论,从史料出发,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酒、文人与世道人心、文人的言与行的关系等问题谈得十分透彻,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中国传统的评论观念:知人论世。在鲁迅那里,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他对人生的深刻认识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建议大家去好好琢磨一下这篇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文学评论,从中感悟文学的真谛。

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一讲

女性文学 :在身体写作之外

还是从那句老话说起吧 :文学是人学。

因此 ,文学就有了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之分。

这些年来 ,女性文学一直十分热闹。一批又一批的女作家不断以令人刮目相看的好作品、奇书在文坛上和社会上引发轰动效应。中国文学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女作家群星灿烂的时代。甚至在五四时期 ,女作家的数量、作品的数量和质量 ,就整体而言 ,都无法与当代相比。

但评论界一谈到女性文学 ,常常就是“身体写作”、“欲望叙事”之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的确 ,当代女性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但在整个女性文学的格局中 ,那些因为“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走红的作家也只是一部分 ,甚至可以说 ,只是一小部分。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女作家其实还是走着关注女性的命运的路子的。而这一部分作品中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又常常是以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依托的。现在的问题是 :女性文学的这一部分可以引出怎样的新话题 ?

我想 ,“女性文学 :在身体写作之外”就是一个很值得一做的题目。这个题目 ,至少可以分出这么几个更细的部分来谈。

第一个话题是女性与历史。在我看来 ,王安忆对历史的反思就很有独到之处。她的《长恨歌》充满了怀旧的情绪 ,浸透了世俗情怀。但为什么读来和另一些描写世俗生活的作品感觉不一样 ?例如张爱玲的《金锁记》、池莉的《烦恼人生》、张欣的《爱又如何》。因为《长恨歌》中多了一层历史和文化的沧桑感。像小说中“上海的小姐们就是与众不同……上海这城市的繁华起码有一半是靠了她们的名利心”这样的句子就很有历史感 ,写出了女性的名利心与城市的繁荣之间的深刻联系(你甚至可以读出女权主义的意味 :女人是怎样创造历史的

……) ,也写出了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样的句子很大气 ,能唤起读者的沧桑之思。另一方面 ,像王琦瑶这样的小女子 ,原本只有“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 ,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 ,好像与历史没什么关联。在革命的年代里 ,她也只满足于躲在“世界的边脚上” ,靠着对旧生活——“罗曼蒂克”生活的追怀打发日子。作家告诉我们 :“上海的市民 ,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 ,都是边缘人。”然而 ,在这“小处”之下 ,上海市民“是有着一股坚韧”的。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活着”二字的深处 ,“还透着知天命 ,是个大道行”。也就是说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是有着不可小看的历史玄机的 :平凡 ,就意味着疏远政治的狂热 ,意味着顽强的生命力、豁达的人生观。这样 ,王安忆就写出了她对上海市民乃至中国百姓的民族性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当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随风而逝 ,被压抑了多年的旧上海的生活方式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这时 ,上了年纪的王琦瑶竟然成了那些狂热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青年的“先导和导师” !这样的情节真是耐人寻味 :一个热衷于“沪上淑媛”的生活方式的小女子竟因为自己远离政治的个性而保留下来一份旧上海的文化遗产 ;一个普通市民竟然因为历史的曲曲折折成为当代青年的“导师” !在这样的情节背后 ,我们是否可以体会出作家的匠心 ?她不仅是要为上海市民谱一曲感伤的咏叹调 ,而且揭示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历史规律 :总有那么一批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逍遥处世的普通人 ,常常于无意中逃避了政治的劫难。无论他们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实际上都在冥冥中延续了道家“逍遥”精神的命脉。当代作家中 ,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写一个“好吃佬”因为历史的动荡阴差阳错成为守护苏州传统美食文化的美食家 ,王蒙的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写“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逍遥派’ ,这不是东方哲学、东方政治的奇迹吗” ,都与《长恨歌》异曲同工 ,都写出了个性(哪怕是十分卑微的个性)、个人生活方式(哪怕是边缘、另类的生活方式)可以超越历史的深刻哲理。由此可见 ,一谈起世俗化就不屑一顾也许有失偏颇。小人物也在默默地守护着可贵的文化传统 ,世俗的生活方式有时比伟大的政治理想更符合人间正道。《长恨歌》因此而写出了—一个女性、一种生活方式与历史玄机之间的不谋而合 ,发人深思。这样的反思比起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些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

作品是不是更有深长的意味？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研究日常生活已经成为 20 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而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像海德格尔那样深刻揭示了现代日常生活使人全面异化的思想家相当引人注目。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波逐流的态度就意味着个性的丧失。关于这一思潮，我国学者衣俊卿在《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4 期）一文中曾经作过介绍。这样的批判当然言之成理，因为人类永远是需要不断超越的。尽管话是这么说，但我们仍然不能不注意到贯穿于《美食家》、《长恨歌》、《狂欢的季节》等作品中的中国民间智慧：以逍遥的态度去躲避政治的灾难，在平凡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活法当然不像海德格尔心目中的哲人的精神境界那么崇高，但它的确是老百姓求生存、远离灾祸的重要法宝。从这个角度看去，对于当代世俗化浪潮的复杂性、对于中国民族性的一言难尽，我们会有更具有历史感的深入思考吧。我甚至觉得，当我们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谈论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时，事实上就为重新理解市民文化、民间智慧打开了大门。老百姓的活法与哲学家的境界各有千秋，本不足怪。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不对？

回到王安忆的话题上来。她为什么能将一个世俗化的故事写出深刻的历史感来？我觉得，这恐怕与她一直不拘泥于女性的立场有关。她当过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成长于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看人生常常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习惯从大处着眼看社会，想问题。据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回忆，她在安徽下乡插队期间写的家信中，就已经有不少使母亲为她暗暗担心的独特的想法了。这种在“文革”中就已经具有的独立观察人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使她能在思想解放的大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就脱颖而出，写出了一系列很有反思深度的优秀作品——像《墙基》、《流逝》那样从非常独到的角度反思“文革”，成功超越了“控诉‘文革’”的主题的作品，就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反思“文革”的新主题。《墙基》写“文革”前城市底层社会与中层社会之间的地位差别是导致“文革”爆发以后底层社会“造反”的重要原因，但“造反”根本没有改变原来的社会矛盾，这一主题发人深思。《流逝》讲述了一个资本家的媳妇端丽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中感到空虚，在“文革”的磨难

中反而变得能干了的故事,也提出了这样的哲学命题:“十年的苦难,留给每个人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而在一个人的每一个时期也都是很不一样的。这会儿,端丽从这十年的体验中吸取的只是一种实惠精神。”这算不算是一种反思?这当然不是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的反思,而是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反思。如果这样的思考是成立的,那么,大家是可以从《流逝》中看出《长恨歌》主题的滥觞吧。的确,从《流逝》到《长恨歌》,这中间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王安忆关注“文革”中的日常生活,开掘日常生活消解政治狂热的积极意义,充分显示了女性作家在感悟人生、反思政治、描写女性的社会生活方面达到的独特高度。

大家知道,王安忆也写过“性文学”作品。她的“三恋”曾经名噪一时。所谓“三恋”指的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麦秸垛》的发表,文坛上出现过“性文学”的热门话题。当时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十分流行的年头。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极“左”政治压抑人性,《麦秸垛》写传统的妇道观念压抑人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人性心理的复杂性。在这样的思潮中,“三恋”的独特性在哪里?

《小城之恋》(《上海文学》1985 年第 8 期)写在性蒙昧的年代里,两个小人物凭着生命的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徒劳地抗拒着本能,又稀里糊涂地做出了越轨的事情,好像是旨在写人性的强大。但小说结尾写女孩怀孕以后就战胜了孤独,写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人生哲理:性的欲望催生了痛苦,同时催生了母爱。这就写出了欲望与圣洁情感之间的辩证法,也写出了欲望的复杂、深不可测。

《荒山之恋》(《十月》1985 年第 9 期)写一场婚外恋,但作家的立足点却是在写人生的微妙、命运的阴错阳差。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他明知她是逢场作戏,却不由自主地被引动了心;她确是逢场作戏,不料却有点弄假成真。”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身不由己、这样的情感迷惑更能折射出人性的脆弱、命运的强大!

《锦绣谷之恋》写得一般,但《岗上的世纪》写得不同凡响。一位女知青为了招工而不得不有求于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勾引女知青。这样的故事一不小心就会写成一篇已经有不少人写

过的“伤痕文学”，但作家笔锋一转，写本来看不起生产队长的女知青却因为自身欲望的强大（还是身不由己！）而迎合他！他们是在做一场性与权力的交易，但他们又在这场交易中实实在在体验了肉体之爱的激情。这样，作家就写出了理智的需要、阴暗的心计与本能的渴望之间的分离。这篇作品在《钟山》杂志（1983年第1期）发表以后，曾被称为“中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且引起过争议。在我看来，两部作品的主题其实相去甚远，就是在性描写方面，《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比《岗上的世纪》显得风格华美。不过，《岗上的世纪》对理智与欲望分离的揭示与刻画仍然有相当的人性深度。也就是说，王安忆的“性文学”是立足于揭示人心的微妙、命运的阴错阳差的。这样的“性文学”显然不同于那些病态地渲染性放纵的“身体写作”。由此是可以看出“性文学”的不同境界的。

第二个话题是女性文学的伦理学研究。所谓伦理学研究，就是探讨道德、人伦、秩序、是非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让我们来看看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大家知道，在新时期文坛上，张洁是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探讨爱情与婚姻的分裂，写了一场纯粹的“柏拉图之恋”，相当感人。其中是有作家本人的痛苦情感体验的。但是，当那场感人至深的“柏拉图之恋”终于变成了现实的婚姻时，结果如何？《无字》就无情地宣判了转换成婚姻以后的爱情的终结。“无字”，为什么追求了一生，到头来是无话可说？主人公吴为迷恋老干部胡秉宸的革命经历、恃才傲物的气质，好不容易经过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马拉松恋爱”而与他结合在一起，却发现了胡秉宸的虚伪、刻薄。当然，这样的爱情悲剧已有不少。而《无字》的独特在于，将爱情失落的悲剧写到了自审的深处——不是抱怨命运的捉弄，而是反躬自审。小说中写道：“吴为一生都对‘奴才’特别敏感，也拒绝再做一个‘奴才’，可事实上，奴性已渗入她的骨髓。”小说甚至将这奴性追溯到了家庭的血脉中——她家有“为奴的历史”！她的母亲叶莲子痴情地守望着对家庭毫无责任感的丈夫，那忠贞与奴性有什么区别？张洁就这样解构了痴情的传统美德。而当作家进一步写出两代人的痴情追求最终都是一场空时，她不也就写出了“审母”的主题吗？吴为不理解母亲何以对负心的父亲痴痴守望，可母亲就是痴心不改，她的母亲坚决反对她与胡秉宸的爱情，而她偏偏也不惜以令母亲伤心的执著去

追求那到头来让她后悔不已的爱情。两代人的痴情与碰壁表明了什么？真是耐人寻味！“一个过于专一的人，久而久之就会向反面转化。”在这样的感悟中，张洁已经从对爱情的绝望转向了对一种传统品质的彻底否定。“综观人间所有事物，都是冥冥中不知谁在操纵的游戏，结局往往出人意料，胜败由不得自己”——这样的感悟已经显示了作家认同命运无常的无奈心境。像张洁这样曾经那么执著地追求过爱情的人，一旦失望，是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的。

由理想的幻灭而自审，甚至“审母”，其中的痛苦有多深，只有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才知道！我由此联想到了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的忏悔，那是因为自己的良知在政治上受到过扭曲而发出的痛苦呐喊，而张洁的自审则是在自己追求了多年的爱情一朝幻灭以后发出的痛苦叹息。我还由此想到了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表达的“审父”主题——在倪吾诚的懦弱、猥琐形象中，就有王蒙对自己父亲的痛苦记忆和反思。然而，巴金的自审、王蒙的“审父”虽然也发自肺腑，却因为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而显示出精神超越的气概。相比之下，张洁的自审、“审母”则因为聚集了太多的个人生命挫败感，而给人以格外偏执、格外尖锐的冲击力。心理学告诉我们，女性对情感，尤其是对爱情与婚姻生活的重视，常常超过男性。因此，女性如果对爱情感到了幻灭，那绝望也就显得格外彻底吧！只是这样一来，绝望到连痴情和专一的美德也怀疑了、否定了，是不是也太极端了一点呢？

另一方面，《无字》中吴为对父亲顾秋水的“奴性”的冷眼审视也具有“审父”的意义。她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会爱这么一个“猥琐的男人”。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吴为的“审父”与《活动变人形》中倪藻的“审父”之间有相通的精神气质——都体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情绪：中国虽然一直有尊重父母的文化传统，但在实际生活中，当父母不能恪守长辈的规范（像慈祥、做好晚辈的表率，等等）时，子女常常就会走上叛逆的道路。张洁、王蒙都是先接受革命教育成长起来，后来又接受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影响的著名作家，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触及“审父”的主题，就更有某种深刻的文化意义了。不过，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还可以展开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张洁作为一位女作家，她的“审父”所具有的深刻的心理学意义。大家知道，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恋父情结”。弗洛伊德

是泛性论者,在他看来,女孩子从小就有“恋父情结”。他的理论是来自一些实际的病例分析的,但他的理论显然有偏颇之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恋父的。复杂的人生不是体系严谨的理论所能解释得了的。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我想是有文章可做的,那就是中国女性文学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超越。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都没有“恋父情结”的用武之地。在冰心那里,在丁玲那里,在萧红那里,都没有“恋父情结”的影子。而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还可以与“恋父情结”沾上边,那么《无字》就是“恋父情结”幻灭的写照。

说到女性的自审和“审母”,还有一部作品值得研究,那就是铁凝的《大浴女》。在《大浴女》中,主人公尹小跳因为偶然发现了母亲的婚外恋情而憎恨母亲。这种憎恨十分自然地引出了“审母”的主题。但小说的重心却是自审:当尹小跳因为憎恨母亲而连带着花样翻新地折磨着无辜的小妹妹尹小荃(因为她相信尹小荃是母亲偷情的结果),并最终眼看着只有两岁的尹小荃走向死亡而不拉她一把时,作家也就写出了从纯洁到罪恶的一步之遥。而从尹小荃掉进污水井的那一刻起,尹小跳的灵魂也就背上了永远也摆脱不了的罪孽感了。正是那罪孽感使她常常心惊肉跳,甚至使她盼望着被惩罚。这就是“罪与罚”!小说最后写尹小跳终于因为从来没有关怀过母亲而自责(也是一种自审),并由此发现了“内心深处的花园”,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花园的”。

我们可以联系到铁凝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这部小说是通过一个小女孩的眼光去打量外祖母的。这种打量不断暴露出外祖母司猗纹灵魂的可怜与阴暗,那可怜与阴暗是那个政治化的年代造就的,又何尝没有寄托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悲凉之思?一般来说,中国人是特别相信“隔代亲”的,就是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对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疼爱是相当普遍的一种人情。然而,《玫瑰门》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另类的情感:孙辈对祖辈的无情审视。这种情感,可不可以称作“审祖心态”?如果可以,那么对铁凝的《玫瑰门》和《大浴女》的研究就可以从另一个思路切入:从“审祖”到“审母”和自审。

而这样一来,大家注意到没有,张洁的《无字》、铁凝的《玫瑰门》和《大浴女》就与那些常见的、旨在张扬女性的生命激情、渲染女性的隐秘生命体验的“女性文学”区别开来了。我自己觉得,这一部分作品

更值得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做的人还不多,所以,做这样的研究就更有挑战性。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中有许多深刻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内涵,是现成的女权主义理论鞭长莫及的。“审祖”、“审父”、“审母”、“自审”这些关键词有着丰富的思想文化矿藏,有待开掘。在“身体写作”、“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天地广阔得很啊!

伦理关系,应该还包括上下级关系。中国有许多女干部,她们的故事是可以引出女性与政治这个话题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说的第三个话题。在这方面,苏州作家范小青的长篇小说《女同志》就很有看头。《女同志》以万丽在政治上不断要求进步、步步高升的成长历程为线索,通过刻画她在处理她与几个上级的微妙关系和与几个女同事的激烈竞争的矛盾上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当官的不易、政治的云谲波诡,同时写出了作家本人对女性与政治的独到思考。一个官运尚可、城府不深、处世谨慎的“聪明的老实人”,一个一直紧张地琢磨着政治、摸索着进步的女同志,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上司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并在斗争中渐渐感悟到了官场的玄机。一方面,官场上讲关系,讲背景,讲“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进步”与否,常常不由自主,但又不得不耐心地等待机会;另一方面,因为风云际会而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进步”以后,又常常会引来猜疑、嫉妒、非议,导致脾气改变、心态失落、人格扭曲。一方面,在“进步”的过程中,她深深体会到苦涩的滋味——“作为一个女同志,过于追求进步,总是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在大家眼里,一个女人,这么想当官,一定不是件好事情”;另一方面,“权力欲不强的女人,别人就会认为她太软弱,没有能力”,也真是左右为难。这样,作家就在写出了“当官难”(这是《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唱腔)的同时,也触及了一些微妙的问题:女干部怎样自我定位?硬性规定领导班子里配备适当比例的女干部,是否反而“把女性重新置于了‘软弱性别’的位置”?而这些显然与女权主义思路不同的思考,表现了作家对女性问题的独特看法。

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在万丽“进步”的道路上,一直有男性的指引与提携。这一独特的设计,显然也是与女权主义的主张相悖的。其中,既有作为局外人的老同学康季平的不断点拨(而这点拨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万丽的爱),也有老领导向问的大力提携(而向问又是

康季平的舅舅)。小说在最后点明向问与康季平的舅甥关系,足以促使万丽如梦方醒:“什么才女,什么工作能力强,什么大气大度有魄力,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康季平?因为向问是康季平的舅舅?”这样的扪心自问,不仅可以使人自然联想到“政治与关系网”这种尽人皆知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读出作家对女干部从政的某些深刻见解——她没有写人们常见的“女强人”形象(“女强人”在历史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上都屡见不鲜,说明中国女性实际上一直是有着发奋有为的传统的。我甚至觉得,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固然有西方女权主义影响的原因,但与中国历史上的卓文君、班昭、武则天、梁红玉、“杨门女将”、柳如是、秋瑾这些女中豪杰的深远影响不可分割),而是刻画了一个“聪明的老实人”形象。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女干部的谨慎、困惑和遇事就向康季平请教才更具有发人深省的普遍意义吧(显然,在女干部的庞大阵营中,“女强人”毕竟是少数,“聪明的老实人”更多)。她不贪,却不能不身不由己地变得“自私、冷酷、无情”起来;她能干,但在庞大的“关系网”中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官场使人性异化的主题,在此已昭然若揭。

《女同志》因此而在“女性文学”中别具一格,也在近年来流行的“官场小说”中占有了引人注目的一席之地。这是一部关于女干部的“成长小说”。这样的小说似乎不多,这一现象也是耐人寻味的。不知道女权主义者为了改变这样的现象能做些什么。

第四个话题是女性的底层体验。这些年,关于文学应该关注底层生活的话题相当热门,这体现了人道主义情怀的重新回归。在这方面,女作家已经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里谈三位作家。

一位是盛可以。盛可以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有漂流深圳、北京、沈阳的经历。她的长篇小说《活下去》(又名《北妹》)描写了一个打工妹钱小红坎坷的求生经历。那些下流的男人欺负她,她和她的小姐妹只能“靠自己”去生存、去拼搏。失身、受骗、被老板剥削,成了她们的家常便饭,她们在重重的磨难中变得泼辣、粗鄙起来,学会了骂人,也学会了以性为武器去捉弄心怀叵测的男人。她们在底层社会像“恶之花”一样开放。《活下去》这个题目很容易使人想到余华的小说《活着》。《活着》中的福贵活得麻木而坚韧,而《活下去》中的钱小红则活得泼辣也顽强。应该说,《活下去》也有比较明显的“欲望”主题。

小说写“钱小红 16 岁时就熟透了 ,没有心思学习” ,写她硕大的胸脯如何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而她也在生活的漩流中不时利用自己的这一性别特征去诱惑她看中的男人 ,并渐渐习惯了在爱情游戏甚至性爱游戏中排遣生命的激情。小说中有不少底层社会的粗话 ,也还原了底层生活的另一面——因为生活质量的糟糕 ,情感也变得粗鄙了。但作家没有刻意去渲染性欲的泛滥 ,而是写得很有生活的质感 ,而且比较节制 ,显示了作家走出“身体叙事”、“欲望叙事”的小天地所作的可贵努力。这部小说无论在“女性文学”中 ,还是在“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中 ,都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

另一位是林白。林白是“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她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作品(像《子弹穿过苹果》、《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一个人的战争》等) ,充满了对女性的自恋、恋父、同性恋种种情态的描写 ,具有相当的心理和文学的深度。到了新世纪 ,她终于走出了私人生活的狭小空间。这也许与她已经穷尽了“欲望叙事”、必须别开新路的考虑有关 ,又正好与这些年关注社会底层的潮流相吻合。她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是一位在北京打工的湖北中年妇女木珍的口述实录 ,写出了朴素中透出粗俗的底层生活气息的当今农村生存状态 ,内容厚实。在木珍的生动讲述中 ,农村的干部减少了 ,上访的事经常发生 ,常常闹出人命 ;许多学校也都空了 ,因为很多孩子不想读书 ;人们没日没夜地打牌赌博 ,疯狂到废寝忘食 ;结婚都不领结婚证了 ,离婚也已经不新鲜了 ;卖淫嫖娼的事情也司空见惯了 ;迷信、谣言都十分流行了……一切都混乱不堪 ,但在木珍的讲述中 ,一切也都十分自然。在这本书的“后记”中 ,林白反省了自己的创作 :“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 ,内心黑暗阴冷 ,充满焦虑和不安 ,对他人强烈不信任。”而当她忽然通过木珍的讲述发现了“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时 ,她也就产生了“多向民间语言学习”、“多向生活学习”的冲动。由此可见 ,林白从“欲望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变不仅具有文学创新的意义 ,还具有换一种活法的人生意义。她将《妇女闲聊录》看做自己“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化、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 ,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事实上 ,她的《妇女闲聊录》在 21 世纪初的中国女性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文学和社会学意义。

顺便说一下 ,口述实录文学也值得注意 ,这一体裁具有很强的真

实性、现场感。20世纪80年代,张辛欣、桑晔曾出版了长篇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作品真实记录了几十位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在80年代初的人生感受,风靡一时。接着是冯骥才的口述实录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是几十位“文革”的过来人对“文革”的回忆,具有丰富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内涵。《北京人》贴近现实,《一百个人的十年》回眸历史,但都还原了人生的复杂性、个人性与真切感。还有戴晴的《中国女性系列》,记录了几个女性的心理独白,也具有社会学、心理学、女性学的丰富意义。20世纪90年代畅销一时的安顿的口述实录文学《绝对隐私》,其实是戴晴的《中国女性系列》的延伸。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一般的报告文学、社会调查都无法代替的个性化独白。这样的独白告诉我们,无论时代的大潮涌动得多么强劲,总有一些人的体验是非常独特、非常微妙的。而《妇女闲聊录》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让一个农妇想到哪说到哪,而不是像《北京人》、《一百个人的十年》那样让许多人各说各话。这就还原了一个普通人眼中和记忆中的现实与历史。这样的长篇口述实录文学可以启迪我们:一个普通人的心中,是有一部个人化的历史和社会画卷的。这样的历史和社会画卷是与官方的正史、知识分子眼中和著作中的历史很不一样的“民间的历史”。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注意到这一体裁?

还有一位是须一瓜。近年来,她的小说写得相当有特色。她擅长写犯罪题材,通过写犯罪,剖析剧烈社会矛盾冲击下普通人心理的扭曲与变态。像《第三棵树是和平》(《十月》1997年第2期)就剖析了一个卖淫女杀夫的心态。孙素宝的丈夫生性脾气暴躁,因为失业而虐待她,不仅砍烂了她的4条内裤,而且常常在痛打她后泄欲,甚至用刻刀在她的腹部刻字,甚至咬掉了她的半只耳朵!在这样的刻画中,一个虐待狂的变态灵魂惊心动魄地暴露无遗。而孙素宝在饱尝了虐待之苦、忍无可忍的压力下一时性起,杀死了虐待狂丈夫。这也是底层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心理素质糟糕的人渣,常常在虐待弱者中宣泄着疯狂的罪恶能量;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许多人因为心理失去平衡铤而走险。须一瓜写出了这一点,写出了家庭暴力对女性的戕害,也写出了弱者在忍无可忍中犯罪的无奈,读来令人叹息。而短篇小说《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上海文学》1999年第3期)写家庭矛盾,也别具一格。阿青做生意,父亲照料家。老人勤劳,心细,但常常趁阿青

外出时偷窥儿媳晚娥洗澡。晚娥发现后愤怒,可又无奈。阿青知道以后怒打父亲,也痛骂妻子。而不知内情的村邻则只怪阿青不孝……小说写家庭暴力,写为父的性苦闷,写为妻的里外不是人、有苦无处诉,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因为父亲的不是而从此不得安宁。小说十分逼真地写出了当今社会中相当常见的家庭悲剧。须一瓜因此值得关注。可不可以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去研究她的作品,从中发掘研究女性文学的新话题?值得一试。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讲先讲到这里。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跳出那些关于“身体叙事”、“欲望叙事”的流行话题,跳出以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进行生搬硬套的研究的路数,从作品出发,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作品,尤其是要从作品的复杂性出发,从作家的个性出发,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当代女作家在作品中超越时髦理论、超越流行模式的可贵经验。

第二讲

男性文学与阳刚之气

多年来,女性文学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有女性文学,就应该有男性文学吧。事实上,不是也有许多男性作家在不断书写着具有阳刚之气的文学作品吗?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研究男性文学。这有点怪。这样,就顺理成章产生了这么一个话题——男性文学与阳刚之气。

我记得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文艺评论》杂志就呼唤过阳刚文学。应该说,有一些男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显示了阳刚之气的。蒋子龙笔下的改革家形象(像《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光朴)、柯云路笔下的青年改革家形象(像《新星》中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朱苏进笔下的当代军人形象(像《引而不发》中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西丹石)、张承志笔下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像《北方的河》中那个一口气考察了北方几条大河的考研青年)等都是。到了 1989 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还在幽默喜剧《寻找男子汉》中借女青年择偶时看不起“奶油小生”,也看不起虽然敢于抓流氓却在上司面前挺不起腰杆的懦夫,发出了“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并且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为什么真正的男子汉不多了?因为“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总是又来一个的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从两性的比例上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子汉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我担心整个民族素质的降低”。这样的思考,具有反思历史的深刻性。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许多青年女性“寻找男子汉”的情结不一定具有这样的深意。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女孩子心中标准的男子汉是谁?是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大概日本电影《追捕》唤起了中国女孩子心目中阳刚、勇敢、深沉、有为的感觉。男子汉形象显然是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不同的。而在女孩子可以自由地谈论